

成本上升对广东制造型企业迁移影响的实证分析¹

关红玲 李非

摘要：对于广东地区企业迁移的现象，本文在理论回归与总结基础上，构建分析框架，并结合173家广东制造型企业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文章着重讨论生产成本与贸易成本上升对广东制造型企业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贸易成本上升是企业迁移的主要因素，而市场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迁移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探讨不同产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地区、企业的市场战略与企业迁移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只有市场战略与企业迁移呈显著相关，即企业目标市场涉及国际市场，则迁移倾向越大。同时在迁移地方面，如果企业目标市场涉及国际市场，向省外与境外迁移的倾向越大。

关键词：成本上升 广东 制造企业 迁移 实证分析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一系列变化，加剧了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型的压力。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上升，用工短缺以及新劳动法实施，人民币升值以及出口退税等政策调整，两税合一等等，使珠三角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成本比较优势丧失殆尽，在广东珠三角地区许多城市出现企业纷纷迁移现象。成本自然是迁移的首要因素，但其中什么成本是主导因素？迁移企业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而这种迁移是否向省内东西两翼，然后再向内陆梯度转移，本文围绕上述问题，通过实证研究进行深入分析。

二、理论回顾与假设

国际贸易、发展经济学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国际或者区域产业分工与产业转移的问题。

(一)比较成本与企业迁移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就是探讨国际间产业分工形成的原因、分工格局、利益分配。其中比较优势理论逻辑贯穿从传统到新国际贸易理论，尤其在解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地区对相对落后地区间产业分工关系。

亚当·斯密（Adams Smith, 1776）认为当生产上各具绝对优势国家参加国际分工进行国际贸易，双方都会获益。他从国内专业化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导，贸易双方出口绝对优势产品可以增加各自利益。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产品没

¹ 本研究受到 985 港澳创新平台的经费资助

有绝对优势，是否就不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利？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 1817）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基础上提出比较优势，回答这问题。他认为两国只要相对成本存在差异就可以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获利。就是说在各种商品生产上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优势相对大的产品，而在各种产品生产都处于劣势的国家，应集中生产劣势比较小的产品。

俄林（Bertil Ohlin, 1933）师承赫克歇尔以要素差异解释比较成本差异，提出要素禀赋论，即“赫克歇尔-俄林”，后来萨缪尔森用数学方法证明了俄林的要素均等化定理，因此又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模型。该理论认为，过去分析国际分工产生原因是只强调生产要素的其中一种——劳动，而产品生产成本高低是由生产要素组合决定的。该理论假设在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生产产品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劳动与资本，那么一国将出口那些密集使用其丰富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即资本丰富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劳动丰富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

佛农（Vernon, 1967）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结合。他认为美国产业外迁，是企业为了顺应产品的周期变化，规避某些产品生产上的比较劣势²。他把产品的生命周期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新产品阶段，新产品发明初期（主要在发达国家，如美国）由于技术垄断，新产品尚未标准化只能在本国生产，并向其他高收入国出口；第二产品成熟阶段，新产品在本国以外国家打开销路，并收到原来纯进口的发达国的模仿，此时该产品从知识密集变为技术和资本密集，技术也趋于标准化，如果生产成本国外更低，就将迁到该国，这也是发达国家间贸易比例加剧的原因；第三阶段标准化阶段，原进口发达国成为该产品的净出口国，产品发明国比如美国，失去国外市场；第四阶段，衰退阶段，由于该产品技术高度标准化、机械化，产品由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变成劳动力密集型，生产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是原发明国，比如美国便成为该产品进口国。

由此可见，从国际贸易理论角度，国际或区域间产业分工或转移，都是由比较优势，或者生产的比较成本所推动的，而且迁移的路径是从比较成本高地方向成本比较低地方迁移，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二）区域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

1、区域经济发展梯度

发展经济学家佩鲁（F. Perroux, 1955）认为，从空间上看，增长在不同地区是以不同速度进行的。主导产业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增长速度最快，这些主导产业和有创新能力行业在空间上集聚会形成中心，就是所谓“增长极”，它会带动周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缪尔达尔（G. Myrdal, 1957）认为佩鲁的“增长极”忽略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负面作用。他提出地理上二元经济，即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在空间并存的，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带动过程，是通过“回波效应”走向“扩散效应”，最终可以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回波效应”就是指，劳动、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在收益差异的吸引下，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流动，而经济发达地区则在这种区际贸易中产生连续积累性的扩张。当发达地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到一定程度，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等，引起生产要素供应紧张，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外部规模经济逐步变小，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已变得相对不经济。“扩散效应”就是说，当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生产成本上升，出现外部不经济情况下，发达地区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向其他（落后）地区扩散，这种扩散带动落后

² 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地区发展。

上述发展经济学观点都认为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是现实存在的，指出对于发展中国家，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优先发展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使之成为增长极后通过扩散效益带动落后地区，最终实现整体经济快速发展。

由此可见，区域经济发展是由发达地区通过“扩散效应”，把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扩散到落后地区。

2、区域间梯度产业转移与企业迁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5）³根据日本纺织工业成长过程，提出“雁行形态产业发展论”。认为后进国工业发展一般经历国外进口——本地生产——开拓出口——出口增长这几个阶段。进口、本地生产、出口的曲线形同三只大雁。日本学者山泽逸平先对“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进一步描述为：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出口（逆进口）五个阶段，更详尽展示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不仅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而且可供出口。该理论认为这种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先在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出现，然后才在生产资料产业中出现**。雁行形态理论，实质上是建立动态比较优势原则上的后进国追赶经济发展理论。所谓动态就是注重长远利益，强调通过进口替代，实现产业结构及由此决定的贸易结构的高级化。就是后进国，先实行进口替代，然后不失时机地发展出口替代⁴。

由此，如果我们加上佛农（1966）“产品生命周期说”，即阐述发达国家根据产品生命周期规律，通过产业进行国际转移，而获取比较成本的优势的学说。那么整个国际或者区域产业垂直分工，梯度转移的脉络清晰可现——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在区域经济里面，产业转移也是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落后地区迁移。

（三）国内外关于迁移的研究

梁琦（2004）指出随着运输和贸易成本的降低，加工制造业倾向与迁往低工资地区，但这些地区还是离中心相对比较近。

陈耀和冯超⁵（2008）运用克鲁格曼新经济地理学框架对近期长三角与珠三角企业迁移进行研究。他们认为长三角与珠三角产业集群中产品出口导向为主，贸易成本与本地产业关联（生产成本）为影响企业迁移的主要原因。作者建立沿海企业利润模型——企业利润是收益与成本之差，对于出口企业，收益中销售价格受到贸易成本影响——运输成本、汇兑损益、税率，在目前人民币持续升值下，企业收益下降。总成本方面包括劳动成本以及中间投入品价格，前者受城市拥挤因素影响——房价、交通、水电导致工资上升，后者取决集群中关联企业数量，数量越多价格由于竞争导致专业化而降低。由此在劳动力成本以及汇率相同条件影响下，长三角与珠三角当地企业迁移（产业集群迁移），取决于企业的本地关联度，关联度越大，企业成本越低，企业迁移倾向越小。而从产业梯度转移角度，迁移取决于贸易成本，因此这些产业或企业的下一个迁移地更容易集中在沿海地区。

何奕和童牧⁶（2008）用包含产业专业化指数和产业规模化在区域同行比重以及产业的相对人均产值来计算城市产业集聚的综合指数。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客观存在以产业梯度专业为动力、产业分工为前提的产业集聚现象。

王缉慈⁷（2007, 2008）认为中国产业集聚不同于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集群，靠低土

³ 【日】赤松要：《我国羊毛工业品的贸易趋势》1935；我国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以机械仪表工业为例，1956。

⁴ 车维汉：雁行形态理论研究评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4年第3期

⁵ 陈耀 冯超：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集群迁移，《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3期

⁶ 何奕 童牧：产业转移与产业集聚的动态与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第二、第三类制造业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⁷ 王缉慈：珠三角产业面临“空心化”？《中国报道》2008-9-11

地与劳动成本参与国际分工。随成本上升必然出现外移。但不必然外迁到成本更低的地方。认为政府不是简单将某些产业外迁，而更应帮助产业就地升级转型，将低价值链环境转移，无论迁出地与迁入地政府都应建设好软硬环境。

Romo & Schwartz⁸(1995),用社会学嵌入观点,对1960—1985年间纽约制造业的向地区内或地区外的迁移现象做研究。作者使用了嵌入模型与比较成本模型进行对比检验,运用1960—1985相关数据做了多元逻辑回归分析(polytomou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他们发现制造业的迁移是结构性地嵌入在地区产业环境中,这种地区产业文化导致即使该地区的成本比其它地点成本更高,企业也停留在该地区。只有当区内核心企业——区内交易网络中心节点,面临外部的竞争,严重削弱他生存能力才产生迁移。而外围的企业通常太依靠地区产业环境中的原材料、政策和社会资源的可得性,即使迁移到区外环境可导致生产成本持续下降,也不贸然迁移。研究结论清楚的支持结构嵌入模型。少数核心企业的迁移,在比较成本压力下会外迁,而外围许多企业,甚至在成本差异十分明显时候也不愿意离开这区域。

四小结:

综上所述,在国际经济或区域经济范围内,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是由地区“增长极”推动的,表现为资本、劳动力、与技术对欠发达地区的扩散。而这扩散是建立在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上的。这种扩散或者经济的带动,具体通过对外投资和国际或区际贸易,而实现产业梯度转移而推动的,从而出现产业的国际垂直分工。

从产业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看,知识密集型创新产业首先在发达国家诞生,当产业走向成熟;产业从知识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从而产业向次发达国转移;当产业走向标准化,产业从技术密集向资本或者劳动密集型转变,产业又从次发达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因此对于改革开放30年后的珠三角,过去靠承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当今天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升,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比较优势消失,因此必然向周边劳动等要素成本较低的周边地区迁移。

对于成本的划分有多个维度,经济学探讨企业经营决策时,把成本划分为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当衡量产业密集使用某种资源时,又按生产要素划分,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研发成本等。由于珠三角企业大都从事外贸出口,因此本文将成本,划分成贸易成本,以及非贸易成本,而非贸易成本在这称为生产成本。贸易成本主要是汇率,以及相关贸易及税收政策引起;而生产成本主要是原材料、能源、劳动力成本引起的。

假设 1a (H1a): 企业所面临生产成本上升幅度越大,企业迁移倾向越大。

假设 1b (H1b): 企业所面临贸易成本上升压力越大,企业迁移倾向越大。

三、成本对迁移的影响实证分析

(一)样本收集与描述

本研究收集的样本,来自于2008年6-8月间对广东的企业,重点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进行调查。主要采取四种方式,一是在中大管理学院、岭南学院MBA、EMBA课堂上发放;一部分是走访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当场填写,或者在当

王缉慈、李鹏飞,陈平:制造业活动地理转移视角下的中国产业集群问题,《地域研究与开发》2007年10月

⁸ Romo & Schwartz: 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of Business Decisions :The Mi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New York State ,1960 to 1985, 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 ,Dec,1995

地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会议上发放填写当场收回，比如笔者调研了东莞部分企业及在东莞台商协会组织的 500 人大会上发放问卷；另外一部分通在深圳等地发放；还有一部分通过电子问卷形式发放。共发放 1000 份问卷，回收 336 份，回收率 33.6%；其中有效问卷 300 份。由于本研究主要对象以制造业为主，所以在有效问卷中根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行业划分⁹，剔除非制造行业，剩下有效问卷 173 份。样本基本情况如下表：

从下表可见，本研究的制造企业样本以民营、外资与中外合资为主，共占 84.4%；这些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迁移的决策权，对环境变化更为敏感，因此也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接受调查的这些企业 78.6%分布在广东珠三角地区，其中深圳占总样本 38.7%，东莞 10.4%，是目前受企业迁移困惑最多的地区。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对制造业的大中小型的划分标准，300 人以下为小型、300—2000 人是中型、2000 人以上是大型¹⁰。据此对受访企业的规模进行分类，发现受访制造类企业，83.2%是中小型制造业，符合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规模特征。从受访企业的产业类型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比 30.1%、资本密集占 17.9%、技术密集占 50.3%。从受访企业的市场战略看，22%企业以出口为主，38.2%企业以内销为主，有 37%的企业内外市场兼顾。样本中 58.4%制造企业具有 8 年以上的历史。

本研究受访者在企业职位是部门经理以上的占 71%，其中副总经理以上占总样本 30. %，表绝大部分受访有参与企业迁移等决策或掌握相关信息。在从事该行业的年限超过 8 年以上达 60.1%，在该企业就职时间超过 4 年也有 55.5%。因此对该行业和企业情况了解比较。

表 1 样本背景特征描述性统计

		样本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企业性质	国有企业	27	15.6	15.6
	民营企业	70	40.5	56.1
	中外合资	17	9.8	65.9
	外资	58	33.5	99.4
	缺失值	1	0.6	100
企业产业类型	技术密集	87	50.3	50.3
	资本密集	31	17.9	68.2
	劳动密集	52	30.1	98.3
	缺失值	3	1.7	100
企业规模	小型（300 人及以下）	78	45.1	45.1
	中型（300-2000 人）	66	38.2	83.3
	大型（2000 人以下）	27	15.6	98.9
	缺失值	2	1.1	100
企业市场战略	全球化市场	38	22.0	22.0
	国内市场	69	39.9	61.8
	两者兼顾	64	37.0	98.8
	缺失值	2	1.2	100

⁹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标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http://www.stats.gov.cn,2008-10-02>
¹⁰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标准：统计大中小企业划分办法，2003-05-22，<http://www.stats.gov.cn,2008-10-02>

		样本数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企业成立时间	1 年以下	1	0.6	0.6
	1-3 年	34	19.7	20.3
	4-7 年	23	13.3	33.6
	8-15 年	52	30.1	63.6
	15 年以上	49	28.3	92.0
	缺失值	14	8.1	100
企业所在地	深圳	67	38.7	38.6
	东莞	18	10.4	49.1
	广州	40	23.1	72.2
	珠三角其他地区	11	6.4	78.6
	非珠三角地区	24	13.7	92.5
	缺失值	13	7.5	100
受访者职位	董事长/总经理	23	13.3	13.3
	副总/总经理助理	29	16.8	30.1
	部门总监/经理	70	40.5	70.5
	基层管理人员	32	18.5	89.0
	普通员工	17	9.8	98.8
	缺失值	2	1.2	100
从业经验	1 年以下	7	4.0	4.0
	1-3 年	17	9.8	13.9
	4-7 年	41	23.7	37.6
	8-15 年	80	46.2	83.8
	15 年以上	24	13.9	97.7
	缺失值	4	2.3	100

(二)成本上升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文先对测量成本上升的指标进行了信度分析，4 指标的信度达到 0. 725，表明测量指标内部一致性与稳定性较高。为了检验测量指标反映所测量构念的程度，确立潜在构念因素效度，本文紧接着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及确认性因子分析，进行效度的检验。

从表 2 看，在成本上升研究中，主要抽取了两个特征：贸易成本上升、生产成本上升 KMO 指标为 0. 627，处于可以接受标准，巴特利球体检验 P 值为 0. 000，表示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表 2 成本上升的 KMO 和 Bartlett's 检验		
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		.627
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	Approx. Chi-Square	175.412
	df	6
	Sig.	.000

运用 SPSS16.0 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抽取因子，从表 3 可见，正交旋转后，特征根大于 1 有两个因子，其累计方差解释力 79.56%，一般而言选出因子累计解释方差达 60%以上就是可以接受的。下表中成本上升两特征值，分别解释 41.47%和 38.1%的初始方差，累计解释力接近 80%。

表 3 成本上升主成分总体方差解释						
主成分	初始值			正交旋转后的统计值		
	特征值	解释方差%	累计解释方差%	特征值	解释方差%	累计解释方差%
1	2.188	54.689	54.689	1.659	41.465	41.465
2	.995	24.869	79.558	1.524	38.092	79.558
3	.469	11.713	91.271			
4	.349	8.729	100.000			
抽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从表 4，再看提出因子载荷矩阵。因子载荷是观察变量与因子间的相关数。邱皓政（2006）认为，矩阵中载荷值代表因子与题项的相关性，如果载荷越大，就反映该题项在因子中重要影响力。下表表明测量项目因子载荷较高。

表 4 旋转后的成本上升主成分矩阵 a		
	成分	
	因子1	因子2
	生产成本上升	贸易成本上升
汇率波动影响 C02		.809
外贸政策影响 C03		.897
原材料及能源影响 C04	.872	
用工短缺及物价影响 C05	.898	
抽取方法：主成分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旋转 a. 旋转后3次迭代后收敛。		

上述表明提炼出两因子生产成本上升、贸易成本上升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三）成本上升确认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本文使用 LISREL8.54 软件对成本上升的构念模型进行确认性因子分析。其一阶因子分

析结果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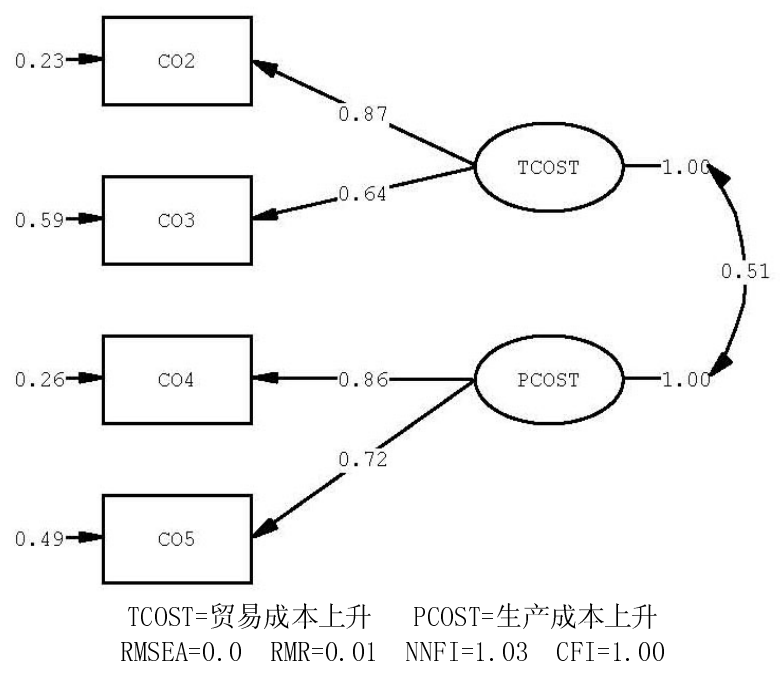


图 1 比较成本一阶两因子模型

模型各类拟合指标较好，其中 $\chi^2/df = 0.23$ ，符合判断标准 $\chi^2/df < 2.5$ ；RMSEA=0.0，符合判断标准至少<0.1，最好<0.08；GFI=1.00，符合判断标准>0.9；CFI=1.00，符合判断标准>0.9；NFI=1，NNFI=1.03，符合>0.9的标准；RMR=0.01，符合判断标准<0.08。上述指标均表示该模型的拟合较好，每一个题项载荷超过 0.64，两个因子之间的相关性等于 0.47。综上所述模型中对潜在构念的测量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模型与数据具有较好的拟合程度，这表明成本上升两因子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四、逻辑回归分析

将上面验证的 2 因子：贸易成本上升、生产成本上升与“是否迁移”（迁移倾向）Y 进行回归，其中 Y 是分类变量，不迁移为 0，迁移为 1。本研究使用的是二分逻辑回归的后向分析方法（Backward Conditional）。样本情况：共有 173 样本，其中选择不迁移 129 家，迁移 44 家。经过 2 步逻辑回归，结果如表 5：

表5 逻辑回归后向分析 Variables in the Equation						
	B	S. E.	Wald	df	Sig.	Exp(B)
Step 1 ^a 贸易成本上升	.519	.172	9.090	1	.003	1.681
生产成本上升	.071	.182	.154	1	.695	1.074
Constant	-2.743	.668	16.854	1	.000	.064

Step 2 ^a	贸易成本上升	.548	.157	12.144	1	.000	1.730
	Constant	-2.567	.487	27.832	1	.000	.077

a. Variable(s) entered on step 1: 贸易成本上升, 生产成本上升.

b. Two-tailed

回归的最后结果我们发现, 只有贸易成本上升对迁移的影响是显著的 $P=0.001$ ($P<0.01$), 而生产成本上升对迁移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是正 0.548, 显示 54.8%企业迁移, 与贸易成本上升有关。

四、迁移的分类比较

(一)产业类型比较

问卷中, 测试贸易及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下, 询问是否考虑迁移。而表 6 比较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劳动密集的企业对迁移的考虑。

剔除缺失值, 纳入分析的样本有 170 家企业。其中技术密集企业占 51.2%, 资本密集的占 18.2%, 劳动密集占 30.6%。不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74.1%, 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25.9%。

从企业是否迁移行为看, 其中考虑不迁移企业中, 技术密集型占 50%、资本密集占 21.4%、劳动密集占 21.2%; 而考虑迁移的企业中, 技术密集占 54.5%, 资本密集占 9.1%, 劳动密集占 36.4%。

从产业类型看, 技术密集型企业 72.4%不迁移, 27.6%考虑迁移; 资本密集型企业 87.1%考虑不迁移, 12.9%考虑迁移; 劳动密集型企业 69.2%考虑不迁移, 30.8%考虑迁移。虽然劳动密集型企业倾向在三者比重中较高, 但总体而言三种产业类型中, 70%左右企业不迁移, 而 30%左右企业考虑迁移。

表 6 产业类型与企业考虑迁移交叉列表

			企业迁移考虑		总计
			不迁移	迁移	
产业类型	技术密集	Count	63	24	87
		% within 产业类型	72.4%	27.6%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50.0%	54.5%	51.2%
		% of Total	37.1%	14.1%	51.2%
产业类型	资本密集	Count	27	4	31
		% within 产业类型	87.1%	12.9%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21.4%	9.1%	18.2%
		% of Total	15.9%	2.4%	18.2%
	劳动密集	Count	36	16	52
		% within 产业类型	69.2%	30.8%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28.6%	36.4%	30.6%

	% of Total	21.2%	9.4%	30.6%
总计	Count	126	44	170
	% within 产业类型	74.1%	25.9%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100.0%	100.0%	100.0%
	% of Total	74.1%	25.9%	100.0%

最后比较三种产业类型在考虑迁移方面的一致性，如表7，发现Pearson卡方（P=0.174）、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nal）（P=0.142）、线性相关卡方（Linear-by Linear Association）（P=0.834），所有P值大于0.05，不能拒绝三种产业类型对迁移考虑一致性的假设。也就是说企业考虑迁移与否，与企业所属产业类型无关。

表 7 三种产业类型企业考虑迁移的一致性检验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3.501 ^a	2	.174
Likelihood Ratio	3.898	2	.142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044	1	.834
N of Valid Cases	170		

a. 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8.02.

（二）企业规模比较

表 8 比小型企业（300 人及以下），中型企业（300-2000 人），大型企业（2000 人以下）对迁移的考虑。

剔除缺失值，纳入分析的样本有 171 家企业。其小型企业占 45.6%，中型企业占 38.6%，大型企业占 15.8%。不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74.9%，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25.1%。

从企业是否迁移行为看，其中考虑不迁移企业中，小型企业占 44.5%、中型企业占 39.1%、大型企业占 16.4%；而考虑迁移的企业中，小型企业占 48.8%，中型企业占 32.7%，大型企业占 14%。

从企业类型看，小型企业中 73.1%不迁移，26.9%考虑迁移；中型企业中 75.8%考虑不迁移，24.2%考虑迁移；大型企业中 77.8%考虑不迁移，22.2%考虑迁移。总体而言，无论大、中、小型企业，有迁移考虑占 30 以下。

表 8 企业规模与企业考虑迁移交叉列表

		企业迁移考虑		总计
		不迁移	迁移	
规模	Count	57	21	78
	% within 规模	73.1%	26.9%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44.5%	48.8%	45.6%
	% of Total	33.3%	12.3%	45.6%
中型（300-2000人）	Count	50	16	66
	% within 规模	75.8%	24.2%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39.1%	37.2%	38.6%
	% of Total	29.2%	9.4%	38.6%
大型（2000人以下）	Count	21	6	27
	% within 规模	77.8%	22.2%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16.4%	14.0%	15.8%
	% of Total	12.3%	3.5%	15.8%
总计	Count	128	43	171
	% within 规模	74.9%	25.1%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100.0%	100.0%	100.0%
	% of Total	74.9%	25.1%	100.0%

最后比较三规模的企业在考虑迁移方面的一性，发现Pearson卡方（P=0.868）、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nal）（P=0.868）、线性相关卡方（Linear-by Linear Association）（P=0.598），所有P值大于0.05，不能拒绝三种产业类型对迁移考虑一致性的假设。也就是说企业考虑迁移与否，与企业规模无关。

地区比较

表 9 比较深圳、东莞、广州、珠三角、非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对迁移的考虑。

剔除缺失值，纳入分析的样本有 160 家企业。其中深圳的企业占 41.9%，东莞的企业占 11.2%，广州企业占 25%，珠三角其他地区企业占 6.9%，非珠三角企业占 15%。不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76.9%，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23.1%。

从企业是否迁移行为看，其中考虑不迁移企业中，深圳的企业占 42.3%、东莞的企业占 11.4%、广州企业占 25.2%；珠三角其他地区占 5.7%，非珠三角地区占 15.4%。其中考虑迁移企业中，深圳的企业占 40.5%、东莞的企业占 10.8%、广州企业占 24.2%；珠三角其他地区占 10.8%，非珠三角地区占 13.5%。

从企业所在地区看，深圳的企业中 77.6%不迁移，22.4%考虑迁移；东莞的企业中 77.8%考虑不迁移，22.2%考虑迁移；广州的企业中 77.5%考虑不迁移，22.5%考虑迁移；珠三角其他地区企业中，63.6%考虑不迁移，36.4%考虑迁移；非珠三角地区企业中，79.2%考虑不迁移，20.8%考虑迁移。总体而言，无论广东哪一个地区的制造企业，有迁移考虑占 30%左右。

表 9 地区与企业考虑迁移交叉列表

		企业迁移考虑		总计	
		不迁移	迁移		
企业所在地址 分类	深圳	Count	52	15	67
		% within 地址分类	77.6%	22.4%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42.3%	40.5%	41.9%
		% of Total	32.5%	9.4%	41.9%
	东莞	Count	14	4	18

	% within 地址分类	77.8%	22.2%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11.4%	10.8%	11.2%
	% of Total	8.8%	2.5%	11.2%
	Count	31	9	40
广州	% within 地址分类	77.5%	22.5%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25.2%	24.3%	25.0%
	% of Total	19.4%	5.6%	25.0%
	Count	7	4	11
珠三角其他地区	% within 地址分类	63.6%	36.4%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5.7%	10.8%	6.9%
	% of Total	4.4%	2.5%	6.9%
	Count	19	5	24
非珠三角地区	% within 地址分类	79.2%	20.8%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15.4%	13.5%	15.0%
	% of Total	11.9%	3.1%	15.0%
	Count	123	37	160
总计	% within 地址分类	76.9%	23.1%	100.0%
	%企业迁移考虑	100.0%	100.0%	100.0%
	% of Total	76.9%	23.1%	100.0%
	Count	123	37	160

最后比较广东不同地区的企业在考虑迁移方面的一性，发现Pearson卡方（P=0.879）、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nal）（P=0.897）、线性相关卡方（Linear-by Linear Association）（P=0.847），所有P值大于0.05，不能拒绝三种产业类型对迁移考虑一致性的假设。也就是说企业考虑迁移与否，与企业所在地区无关。

四、市场战略比较

表 10 比市场战略目标分别是：专注国际市场、专注国内市场、两者兼顾企业对迁移的考虑。

剔除缺失值，纳入分析的样本有 171 家企业。其中市场战略目标是国际市场占 22.2%，国内市场的占 40.4%，两种市场兼顾的占 37.4%。不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74.3%，迁移的企业占总样本的 25.7%。

从企业是否迁移行为看，其中考虑不迁移企业中，专注国际市场占 20.5%、专注国内市场占 46.5.4%、两者兼顾占 33.1%；而考虑迁移的企业中，专注国际市场占 27.3%，专注国内市场占 22.7%，两者兼顾占 50%。

从市场战略目标看，专注国际市场企业 68.4%不迁移，31.6%考虑迁移；专注国内市场企业 85.5%考虑不迁移，14.5%考虑迁移；两者兼顾的企业 65.6%考虑不迁移，34.4%考虑迁移。可以看出，采取专注国际市场和两个市场都兼顾的市场战略企业，考虑迁移比例要高于专注国内市场。

表 10 市场战略与企业考虑迁移交叉列表

		企业迁移考虑		总计	
		不迁移	迁移		
战略目标	国际市场	Count	26	12	38
		% within 战略目标	68.4%	31.6%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20.5%	27.3%	22.2%
		% of Total	15.2%	7.0%	22.2%
	国内市场	Count	59	10	69
		% within 战略目标	85.5%	14.5%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46.5%	22.7%	40.4%
		% of Total	34.5%	5.8%	40.4%
	两者兼顾	Count	42	22	64
		% within 战略目标	65.6%	34.4%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33.1%	50.0%	37.4%
		% of Total	24.6%	12.9%	37.4%
总计	Count	127	44	171	
	% within 战略目标	74.3%	25.7%	100.0%	
	% within企业迁移考虑	100.0%	100.0%	100.0%	
	% of Total	74.3%	25.7%	100.0%	

最后比较三种市场战略的企业与在考虑迁移方面的一性，发现Pearson卡方（P=0.021）、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nal）（P=0.017）、发现P值小于0.05，因此应拒绝三种市场战略对企业迁移考虑一致性的假设。也就是说企业考虑迁移与否，与企业市场战略目标有关。

表 9 三种市场战略考虑迁移一致性检验 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7.743 ^a	2	.021
Likelihood Ratio	8.146	2	.017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581	1	.446
N of Valid Cases	171		

a. 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9.78.

④迁移地比较

问卷中，测试贸易及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的影响下，询问是否考虑迁移后，由此得到迁移组与不迁移组。我们进一步询问若其他地区能大幅降低总成本，同等条件下这两组企业是选择往省内、省外还是境外迁移。表 10 分别比较了

迁移组与非迁移组的迁移地的选择。

剔除缺失值，纳入分析的样本有 157 家企业。其中不迁移企业占 72.6%，迁移企业占 27.4%。总体样本中，选择省内迁移的占 51.6%，省外迁移的占 31.8%，境外迁移的占 16.6%。

从是否迁移行为看，在不迁移组中，58.8%企业认为条件合适，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选择省内迁移；27.2%企业选择省外迁移；14%企业选择境外迁移。在迁移组，32.6%企业认为条件合适，同等条件下将优先选择省内迁移；44.2%企业选择省外迁移；23.3%企业选择境外迁移。

从迁移地选择看，样本中 51.6%企业选择省内迁移，其中不迁移企业选择省内迁移的占 82.7%，而迁移企业占 17.3%。样本中 31.8%企业选择省外迁移，其中不迁移企业选择省外迁移的占 62%，迁移企业占 38%。样本中 16.6%企业选择境外迁移，其中不迁移企业选择此项占 61.5%，迁移企业占 38.5%。

总之，具有迁移倾向的企业中，近 68%企业倾向于省外与境外迁移，而不迁移倾向企业中，认为同等条件下选择省外及境外迁移只占 41%。

表10 迁移地与迁移与不迁移 交叉列表 Crosstabulation

		迁移与不迁移		总计
		不迁移	迁移	
迁移地	Count	67	14	81
	% within 迁移地	82.7%	17.3%	100.0%
	% within迁移与不迁移	58.8%	32.6%	51.6%
	% of Total	42.7%	8.9%	51.6%
省外	Count	31	19	50
	% within 迁移地	62.0%	38.0%	100.0%
	% within 迁移与不迁移	27.2%	44.2%	31.8%
	% of Total	19.7%	12.1%	31.8%
境外	Count	16	10	26
	% within 迁移地	61.5%	38.5%	100.0%
	% within 迁移与不迁移	14.0%	23.3%	16.6%
	% of Total	10.2%	6.4%	16.6%
总计	Count	114	43	157
	% within 迁移地	72.6%	27.4%	100.0%
	% within 迁移与不迁移	100.0%	100.0%	100.0%
	% of Total	72.6%	27.4%	100.0%

最后比较广东迁移组与不迁移组在考虑迁移地方面的一性，如表11，我们发现Pearson卡方（P=0.014）、似然比卡方（Likelihood Rational）（P=0.013）、线性相关卡方（Linear-by Linear Association）（P=0.008），所有P值都小于0.05，因此接受拒绝迁移组与不迁移组企业对迁移地区选择一致性的假设。也就是说迁移组与不迁移组企

业，在考虑迁移地区方面有显著的差异。

表11 迁移、不迁移与迁移地的一致性检验Chi-Square Tests

	Value	df	Asymp. Sig. (2-sided)
Pearson Chi-Square	8.593 ^a	2	.014
Likelihood Ratio	8.713	2	.013
Linear-by-Linear Association	6.971	1	.008
N of Valid Cases	157		

a. 0 cells (.0%) have expected count less than 5. The minimum expected count is 7.12.

五、结论

1、研究的结论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本文发现：1. 贸易成本上升是影响珠三角地区产业迁移的重要原因，贸易成本的回归系数是正 0.548，显示 54.8%企业迁移，与贸易成本上升有关。而生产成本上升对企业迁移没有显著影响。2 通过各种分类比较，发现迁移倾向与企业的市场战略目标有关，而与产业类型、企业规模、企业所在地区都无关系。为了进一步了解迁移倾向是否具有产业类型（劳动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密集）、企业规模、地区的特征，本文进行了分类比较，结果发现大部分迁移企业目标市场在国外，迁移组 77.3%企业市场战略涉及国际市场，而不迁移组只有 53.6%市场战略涉及国际市场。另外在条件合适情况下，在迁移组企业更倾向于省外与境外迁移，两者比重在该组占 67.5%，省内迁移的比重只有 32.6%；而不迁移组企业更倾向于省内迁移，占该组比重 58.8%。

2 现实的回应

(1)许多研究指出，新劳动法的实施、用工短缺、土地等成本上升是企业迁移的原因。但从实证分析看来，虽然新劳动法及用工短缺及原材料导致企业总成本上升。但企业迁移主要原因还是来自贸易成本的上升的压力。

根据资料显示广东（1990—2004）外贸依存度高达 91%，到 2007 年为止，出口贸易仍以加工贸易为主。2005 年在珠三角地 12 市区¹¹中，出口前两位：深圳、东莞占珠三角总出口的 58%。导致外贸成本上升，主要有三个原因：①. 人民币汇率不断攀升。2005 年 7 月 21 日人民币汇率机制走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时人民币兑美元 8.11：1，到 2008 年 6 月人民币兑美元升至 6.8：1，累计升值 15.8%，当年升幅达 6.4%。②. 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调整。自 2007 年 7 月起，国家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出口退税率或取消或降低，平均降低 3%左右；③. 自 2008 年 1 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两部法律法规统一成一部所得税法，在税率等方面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两税合一”开始实施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被取消。这些原因使以出口为主的珠三角企业成本大幅攀升，从而导致企业迁移。

(2)有些观点认为产业迁移遵循从沿海向沿海较落后地区，再向内陆其他省份的迁移，但实证研究并不能完全证实

¹¹ 数据来源：广州市统计局：《珠三角 12 市区经济社会主要指标统计资料》2005，12 市区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肇庆、江门、东莞、中山、顺德、南海、番禺。

这点。如果市场战略目标是国际市场，企业更倾向于省外和境外迁移。但市场战略目标是国内市场，则表现为优先考虑省内落后地区，然后再向省外迁移。例如从实证资料显示，以出口市场为主的广东企业，在条件合适情况下，选择省外迁移的比例最高，44.2%迁移组企业选择省外迁移，32.6%企业选择省内迁移，23.3%企业选择境外迁移。这表明以出口为主的广东制造企业，多数选择是省外迁移，而不是省内其他地区，包括产业转移园。

参考文献

1. Krugman,P.1991,Geography and Trade
2. Markusen, A. 1999 Fuzzy concepts, scanty evidence, policy distance: the case for rigour and policy relevance incritical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Studies*, 33(9), pp. 869–884.
3. McCann, P. & Sheppard, S. The rise, fall and rise again of industrial location theory, *Regional Studies*,37(6&7), 2003 pp. 649–663.
4. Malmberg A, S olvell O, Zander I. 1996. Spatial clustering, local accu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firm competitiveness. *Geografiska Annaler* 78B(2): 85-97.
5. Malmberg, A. & Maskell, P. 2002The elusive concept of localization economies —towards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spatial clustering,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34, pp. 429–449.
6. Romo,F.P., Schwartz,M.,1995,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of Business Decisions :The Migration of Manufacturing Plants in New York State ,1960 to 1985, *Amercian Sociological Review* ,Dec,
7. Schmitz,1995Collective Efficiency :Growth Path for Small-Scale Industry.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1.No.4
8. Fung-Yee Ng, Linda et al: Spatial agglomeration ,FDI ,and regional growth in China :Locality of local and foreign manufacturing investment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o June ,2006
9. Chadee ,Doren Chadee et al: FDI Location at the subnational level : a study of EJV's in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03
10. 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序
11. 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12. 梁琦：《产业集聚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
13.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山西经济出版社 2001
14. 陈耀 冯超：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集群迁移，《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3期
15. 何奕 童牧：产业转移与产业聚集的动态与路径选择——基于长三角第二、第三类制造业研究，《宏观经济研究》2008年第7期
16. 路江涌 陶志刚：中国制造业区域聚集及国际比较，《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The Effect of Increasing Cost in the Relocation of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Guan HongLing Li Fei

Abstract: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data from 173 manufactur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the increasing product cost and trade cost to the enterprises relocation – moving out of the Pearl River Delta. It was found that the increasing trade cost is the major factor to affect the decision of the enterprises. Furthermore, in the related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t industries, different scales, different market strategy, different area, we found the market strategy has significant relation to the reloc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in PRD. Namely the export-oriented enterprises commonly have more motivated to move out: to other province or to other countries.

Keyword: increasing cost Guangdong Province Manufacture enterprise relocation empirical analysis

收稿日期: 2008-11-10

作者简介: 关红玲,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 2005 级博士,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讲师。
李 非,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